

“感而遂通”：符号表征的反向认知*

陈中¹ 姚婷婷²

(1.扬州大学商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0;

2.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符号认知与表征的“遮蔽”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甚至导致了语言论转向。如何走出这一困境,不仅关系到认知模式的重新认识,而且与外语教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息息相关。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而遂通”为立足点,从西方语言符号学中的休谟问题出发,运用索绪尔、皮尔斯、乌克斯库尔的符号学理论对符号活动中的休谟问题进行分析,并且为提升语言学习者的思维能力,进一步以庄子的“心止于符”思想为依据,努力摆脱经验和理性的羁绊,在任运自然的状态下,还符号意义以自由。其实,这种符号表征的反向认知路径更是完善了精神文化符号学的正反向互动的认知模式。

关键词:精神文化符号学;反向认知;感而遂通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23)02-0048-09

1. 引言

符号的表征往往被视为由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或自然认知的意义呈现。每个民族又习惯于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表征,而外语教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语言规律的学习,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以及外界信息的传达。然而,语料的世界是浩瀚的,任何规则和归纳都无法穷尽对语言现象的概括。从主体到客体的符号表征难免会受到理性思维的局限,用有限的主观认知模式去把握无限的客体世界或自然,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力不从心的,甚至还会束缚外语教学的手脚。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探索一条理想的符号表征认知途径?这已成为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随着我国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人才培养的重心已经发生了重要转移,由语言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掌握,转向了获取知识、思维和综合等能力的提升,以此来避免语言知识本身的限制。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透过语言符号表征,敏锐体悟不同文明的精髓,促使异域文化真正内化,甚至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从而努力企及更高的理论和思想境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走出以主体为出发点的现存符号表征的认知模式,探寻一条以客体或自然作为认知出发点的反向认知模式。这就是以自然主体论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哲人的认知方式——“感而遂通”,也是精神文化符号学所努力追求的认知模式。

当前,在外语教学中运用弗拉维尔的元认知策略取得了显著教学成果,元认知又称为反省认知、反省认知、超认知、后设认知,元认知策略有利于外语教学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个非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体裁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1AWW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中,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符号学,语言哲学;姚婷婷(通信作者),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符号学,翻译学。通信作者邮箱:karen1020@aliyun.com

常重要的原因是元认知提升了学生对自己的认知过程的认知以及调节认知过程的能力(司海维 2013: 175-176)。中国传统文化中“感而遂通”虽然迥异于元认知,但同样寻求反思认知、反省认知、超认知,并从独特的角度提升学生的“能知”力。“感而遂通”出自中国古老的《周易》,在印度佛学的输入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东晋学者韩康伯认为,外域的佛学与本土的道家之间的思想关系是“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刘立夫等 2013: 410)。宋代学者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等思想家也以“感而遂通”为依据证明儒学的宽泛性。程颢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无歉少”(程颢、程颐 2002: 43)。虽然程颢是以此来抵御佛学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但这是一种非常良性的文化交流与对抗,既有利于本土儒道等思想的发展,也有利于佛学思想的丰富。与此对应,印度佛学传播者为了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也常常运用“感而遂通”对佛学进行诠释,甚至将“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两个词语直接写进了中国佛学的话语体系中,变成中国本土化佛学的专门用语之一。古代这种透过经典的词句进行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方式,正是现代外语教学与研究可以借鉴的模式之一。

“感而遂通”能不能在当代西方文化的输入过程中,同样担当这种文化桥梁作用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通印度佛学和当代西方两次重要的文化输入,从而形成更理想的人类认知模式呢?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而遂通”为立足点,从西方语言符号学中的休谟问题(Humean problem)出发,运用索绪尔(Saussure)、皮尔斯(Pierce)、乌克斯库尔(Uexküll)的符号学理论对符号活动中的休谟问题进行分析,积极推动西方符号学的本土化和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国际化,以及两者的相互融合,努力为精神文化符号学的正反向互动的认知模式,探寻符号表征的反向认知路径。

2. 主客体质疑：休谟问题的重释

休谟问题是休谟(David Hume)在研究人类知识种类时提出的,也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休谟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从“是”能否推出“应该”的问题。尽管休谟本人对此并未做出完美的回答,却就从主体出发以逻辑思辨为前提的认知活动提出了疑问。休谟认为,人类知识分为两类,即观念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和实际事情(matters of fact);前者“完全决定于我们所比较的各个观念”(Hume 2009: 119),比如算术、代数、几何等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依靠人的主观分析就能发现其关系;后者“是可以不经过观念的变化而变化”(Hume 2009: 121),具有不确定性,不能仅依靠分析观念关系而充分获得,必须依靠感知活动的参与。例如,天鹅“应该”是白色的,就是从最初的感知得来的,后来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在澳大利亚黑天鹅被发现,这一感知被推翻。休谟问题使人们对类似于“太阳‘应该’从东方升起”这样毋庸置疑的观念也产生了疑惑,从而引发了对人类认知模式的质疑,尤其是从主体出发进行归纳演绎的逻辑思维模式。

哲学界关于知觉的模式识别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休谟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说‘休谟问题’的提出,使自然科学或者说归纳知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在知觉的模式识别理论之下,‘类印象’作为知觉的基本前提条件则将使这种危机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因为它更进一步指向了休谟还未加以明确分析的更为基础的东西——图式的‘类’,从而

更进一步把怀疑的矛头合理地指向了休谟说的‘普遍必然的知识’,并加深了休谟说的或然知识的不确定性”(韩旭 2021:70)。知觉的模式识别理论与语言符号有着深厚的渊源,所以语言符号中的休谟问题值得重视。

语言符号活动中同样存在着休谟问题,因为符号的接受是个分阶段的过程,是一个“从感知(perceived),到接收(received),到接受(accepted),到解释(interpreted)”的过程。“‘接收’与‘接受’有细微差别,‘接受’是内化的开始”(赵毅衡 2011:27)。“接受”的过程是将符号再次符号化的过程。根据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符号总是产生新的符号,无限制的符号过程被称之为符号的意指过程,“意指过程包括三个主体的合作行为,即符号、符号对象和解释项,这三种联系在一起的影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化减为成对的符号关系”(Peirce 1998:411)。因此,在皮尔斯看来符号活动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升级过程。每个符号的解释项都承担着新符号代表项的职能,从而转化成为一个新的符号,人类文明也因此得以传承与发展。无论是基于经验还是理性的符号活动,虽然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其中所隐藏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意识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导致人的意识不能真正“进入”对象。语言符号的休谟问题反映了西方符号学中从主体出发的符号意义表征活动所存在的问题。

西方符号学界尽管在学术传统上更注重人的主体性,不过随着生态符号学的兴起,也早已突破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生成模式,开始关注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互动过程的符号生成模式。当乌克斯库尔描述人和动物的世界时,他引入了“环境界”的概念来描述有机生命体的世界,首先存在着有机生命体,有机生命体创造了主观世界,每种生命体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拥有自己的主观世界(Lotman 2002:34-36)。乌克斯库尔的生态符号学理论引发人们去思考,现代人的“行为世界”和“感知世界”是否符合宇宙天地赋予人类的本质状态。生态符号学将天地万物当作“自然文本”,“自然文本”不局限于文字符号与语境之间的联系,而是有机生命体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Maran 2007:279-280)。自然是第一性的,是认知行为的发生者,是自然文本一切意义的创造者。如若没有自然界的消息,人类就无从认知,甚至连人类都无法诞生。人类一直试图在征服和改造自然,但最终必将回归自然。当然,这种回归自然不是回到丛林时代,也不只是生态环境保护,而是要在认知模式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从自然到人的反向认知。这也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 2011:66),搁置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体模式就是这种“法”,保护人的大脑的生态环境,以此达到任运自然的目的,实现“感而遂通”。

要开启“感而遂通”的认知模式,前提就是“无思”“无为”。“《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王弼 2012:242)。这种知觉过程就是要消解认知主体的成见、已形成的概念等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获得与万物相通的状态。“无思”不是没有觉知,“任运自然,不关心虑,是无思也”(王弼、韩康伯 2009:272)。“无为”不是不作为,“任运自动,不须营造,是为也”(王弼、韩康伯 2009:272)。也就是说,只有在“任运自然”“任运自动”的行为状态下,才能产生“感而遂通”的知觉模式。这种任运自然的感通不会将主观思想附加给客观现象而产生某种意义,因此反而能够真正实现符号意义的释放。

现代外语教学与研究过于偏重对语言要素、语法结构等的关注,而对不同文化灵魂与精神的交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更何况这种交流并非仅属于哲学研究范畴,也属于语言符号的

研究范畴。其实,西方自身的哲学也出现了语言符号学转向,因此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与研究进行“感而遂通”这类先秦思想探寻,符合时代发展方向。

3. 意义的自由:任运自然的感通

显然,“感而遂通”并非要确定符号的意义,而是要在任运自然的状态下,还符号意义以自由。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符号学研究的任务,引发外语教学与研究界的重新思考,即语言教学与研究究竟是知识或规律的确定和传授,还是认知能力与人生境界的提升?任运自然的感通是通过“无思”“无为”的“无知”,从而实现“感而遂通”。宋代哲学家张载就此进行了专门阐释:“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则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两端,《易》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丁原明 2004: 168)。“无知”的根本目标是努力消解人为的语言符号所构成的知识,敞开符号自身的意义。

任运自然的感通不仅是认知模式,更是一种存在方式,认知与存在之间关系密不可分。乌克斯库尔的符号学理论起源于对动物活动的考察,动物的“行为世界”是“无思”“无为”的,也就是“任运自然”“任运自动”状态;动物的“感知世界”是“感而遂通”的状态。动物的“行为世界”和“感知世界”更注重“应该”如何存在,而并非“是”什么。《大学》引用《诗经》中的诗句“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王秀梅 2015: 567),发出了“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胡平生 2017: 1165)的感慨。小鸟仿佛很清楚“应该”如何存在,而人类却容易产生“所知障”,因此《大学》感叹人类在应该如何存在的问题上还不如小鸟。动物发出的符号信息不同于人类的语言符号,动物拥有而人类没有的回声定位、化学信息传递等符号传播行为模式,动物符号活动虽然具有非理性特质,但却能够契合宇宙天地的存在法制,这可以触发人类对自身非理性自然本源认知力进行反思。任运自然的感通关注的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人类应该如何存在的问题,认知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追求合理的存在。如果符号的意义蕴藏于合理的存在之中,而不只是认识之中,那么以任运自然的感通为存在模式,就可以真正赋予符号意义自由。

任运自然的感通不是一种理论推断出的结论,而是真实存在的行为结果。行为的“无思”“无为”,不同于概念理解的“无思”“无为”。只有行为上的“任运自然”“任运自动”,才能实现真正的“无思”“无为”,而理解中的“无思”“无为”,不会产生“感而遂通”的知觉。郭店楚简《老子》(甲本)曰:“为无为”(转自刘钊 2003: 2),这里的“为”是要达到“无为”的境界。老子还说“涤除玄览”(王弼 2011: 25),其中的“涤除”就是一种行为,“涤除”的目标是为了“无思”“无为”,而“玄览”类似于“感而遂通”的境界,只有进行“涤除”的行为后,心才能够如同一尘不染的明镜,既可以观照万物又会不留下万物的痕迹。其实,不仅是道家重视行为达成而不是概念理解,儒家亦是如此。《孟子》中“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 2013: 186)的思想寓意类似于“无思”“无为”,以至于“感而遂通”。王阳明传承孟子思想并把自己的学术归为“致良知”(王守仁 2012: 969),这本是与“为无为”不同的两种思想,但如果把“致”与《老子》(甲本)“为无为”中的“为”联系起来,就不难见出,要达到任运自然的感通或曰“良知”,就不能够仅凭概念理解,而是要实现“为”的“无为”,即感通行为。

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世界”特质,就导致了一种文化传播的独特方式形成。人类

文明传播的载体不仅是语言符号,还可以是人的“行为世界”,即传授感知的行为。“感而遂通”实际上就是通过“行为世界”传播“感知世界”的方式。人的感知或曰知觉是难以用语言符号表述清晰的,极易产生歧义。语言符号与知觉只能接近而不可能等同,因此语言符号是无法完全接受和传达知觉的。因此,皮尔斯说:“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事实世界’(world of fact),一个是‘幻想世界’(world of fancy)。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于认为我们是自己的幻想世界的创造者,而且还认为我们只要宣称一个事实,事物就是存在的而不存在任何阻力与效力”(皮尔斯 2014: 21)。语言符号在传授文化时,将不得不固化符号意义,更难以避免阐释者的主观意识。“无思”“无为”的行为模式则以“感而遂通”的方式,传递着不同社会对自然和人性尊重的信息,还符号意义以真正的自由。

其实,任运自然的感通行为并非只是“出世”的,而且也是“入世”的,并非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周易》中的《大象传》就特别关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应有“行为世界”和“感知世界”,寻求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活动法则符合宇宙天地的运行法则,也就是社会活动的“任运自然”“任运自动”状态。《艮·大象》的“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弼 2012: 194)就是表明,人应该在某种“位”中通过意识专一从而达到无邪思杂虑、无妄为拙力的境界。《大象传》中有很多“君子以……”这样的句型,告诫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应有的“行为世界”,从而进入一种通透合理的“感知世界”。

《大象传》就是立足于生活本身寻求“道”,但“道”却并非随便可得,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王弼 2012: 236)。只有拥有不寻常的“行为世界”,才能真正获得类似于“道”一样的“感知世界”。此类告诫在《大象传》中比比皆是,如《家人·大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王弼 2012: 138)、《颐·大象》“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王弼 2012: 103)等。《损·大象》的“君子以惩忿窒欲”(王弼 2012: 152)等,甚至还关注到人的情绪平衡问题。《大象传》更是指明了反向内求的重要性,如《蹇·大象》的“君子以反身修德”(王弼 2012: 145)、《晋·大象》的“君子以自昭明德”(王弼 2012: 130)等。这里指明只有经过反向内求才能真正获得任运自然的感通。《大象传》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基于真实的生活世界,在跌宕起伏的日常生活中寻求任运自然的感通。这如同王阳明所说的“人须在事上磨”(王守仁 2012: 11),在事上磨砺的不是处事能力而是人通透的心性。从符号学角度,只有不脱离生活世界所获得的符号意义自由,才具有真正的现实价值。

现代汉语中“感通”一词就是出自“感而遂通”(夏征农 1979: 3654)。“感通”基于“感知”,而“感知”又可分为感觉过程和知觉过程。知觉过程是对感觉信息进行符号处理的过程,这种知觉过程会受主观意识的影响。北宋哲学家张载说:“世人心,止于见闻之狭”(张载 2020: 154)。感通则就是要尽可能地用感觉过程来克服知觉过程带来的片面性,形成一种新的感知。这种感知可以消解人为的、逻辑的符号处理模式,真正让意义回归自然。显然,“感而遂通”的感知不同于理性认知活动中的感知,后者是主客体分离的状态,前者则是天人合一。这就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向,一种方向是向外运用分析推理寻求知识的模式,另一种是不设立人为障碍让知识进入的反向模式,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反向认知。

4. 反向的认知:心止于符的范式

在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究竟应该如何释放符号的意义,提升学生获取知识、思维和综合等能力,达到“感而遂通”的理想境地?反向认知或许能够为此提供值得借鉴的路径,这里并非简单的批判性思维模式,而是一种返回自然的思维范式。

“反”在先秦哲理中概念独特。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王弼注说:“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王弼 2012: 113)。楼宇烈就此进一步解释:“万物动作如能知道其根本是无,就可以包通万物了”(王弼 2012: 113)。显然,老子“反”的思想是寻求与万物相通,而这种相通的前提是“无”。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同样说道:“返也者,道动也”(转自刘钊 2003: 26)。“返”与“反”相通,其寓意都是要去人的主体性而回归自然。庄子也将“反”与“道”相关联,庄子倡导“反衍”,庄子说:“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郭象 2011: 313)。在庄子思想中,与“反衍”对应的是“以道观之”,显然是为了突破了“以人观之”的局限性。孟子也喜欢说“反”,其“反身而诚”(朱熹 2013: 181)貌似“有我”,但前提是“万物皆备于我矣”(朱熹 2013: 181),当“有我”大到与万物一体时,其本质已是“无我”,从根本上就是指心物一体的状态。

先秦时代,尤其是曾在齐国稷下读书的学士们都比较推崇“反”,韩非子提出的“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王先慎 2013: 46)。其实就是顺应自然之道,目的是为了“去智与巧”(王先慎 2013: 46),方法是“虚以静后,未尝用己”(王先慎 2013: 46),推崇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应该排除主观干扰。管子的“静因之道”(房玄龄 2015: 263)与韩非子的“反形”异曲同工,明确倡导“为道”,即顺应自然地去看待世界,消解人的主观束缚,从而获得由客体到主体的反向认知。

后代学者北宋邵康节提出“反观”,对反向认知描述就更加简洁明了。他指出:“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邵雍 2012: 484)。“反观”显然是与“我观”相对应的,就是要突破主体认知的局限性,走出认知的“遮蔽”困境,以无我的状态,达到“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邵雍 2012: 484)。“以物观物”是一种以自然为主体,让生命达到任运自然的感通状态。反向认知就是破除从主体到客体的“以我观物”,形成由客体到主体的“以物观物”。

人类的知识探索就是在寻求主客体的一致,从主体到客体或从客体到主体的相符,其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反向认知是一种特殊的认知符合论。庄子提出“听止于耳,心止于符”(郭象 2011: 81)。前者是“遣耳目”的状态,后者则是“去心意”的状态。“心止于符”是消解意识对名相符号的执念,不再追求从主体出发寻求主客体的一致。“心止于符”是不作任何分别判断的觉知,是没有以经验为标准的识别活动,更没有类似归纳或者演绎的意向活动。“心止于符”产生的客体与主体相符合,不同于主客体分离的认知,而是主客体相融合的心物一体,正如庄子说“万物与我为—”(郭象 2011: 44)。

如果按照后期道家曾据“听止于耳”提倡反听,“心止于符”也可以说是一种反符。反向认知追求的不是基于认识论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让人从认识世界返回到本体世界。这个本体世界不同于哲学概念中的本体世界,而是包括身体在内的活生生的行为本体。反向认知寻求的是与万物相通的本体状态。

反向认知属于非语言符号活动,是用语言符号无法表述清楚的,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王弼 2012: 244)。语言符号往往只能表现相对的、有限的感知,而对绝对的、无限的感通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是否可以改造现有的语言符号系统来描述非语言符号活动呢?先

秦的很多思想家都开展了积极的探索,老子采用的是“强为之名”的方法,“道”这就是一种勉强“名字”。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王弼 2011: 65)。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名字”本是语言符号活动中的“能指”,要对应于相关的“所指”。如果从反向认知的维度,“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可能是颠倒的,也就是万物中皆有“道”。万物均是“道”的“能指”,而“道”反而成了说不尽的“所指”,而且这种关系是动态不定的。正如《列子》所说“无指则皆至”(叶蓓卿 2011: 108),“道”就属于无指之指,因而不同于普通的语言符号,所以老子还说“道可道,非常道”(王弼 2011: 2)。尽管“道”是无法说清的,但毕竟为语言符号的反向表征,即“能所指”关系倒置,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其实,庄子也运用了“卮言”“重言”等独特的语言符号形式。他提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郭象 2011: 494)。这里“日出”是指每天都处于变化之中,突破了语言符号的时间固化,而“天倪”是指符合自然之道的平衡状态,突破了语言符号的人为固化。唐代成玄英注疏:“无心之言,即卮言也”(郭象 2011: 494)。这就是“无思”“无为”状态中的语言符号形式,或者说是庄子的“天人合一”的语言符号表征。庄子还说“以卮言为曼衍”(郭象 2011: 569)。曼衍也是“无心”的寓意,所以“卮言”是庄子悬置主观成见的体道之言,庄子就是要消解人对语言符号的执念。唐代成玄英说:“卮言,不定也”(郭象 2011: 569)。“卮言”之所以“不定”正如《庄子》所说“指不至,至不绝”(郭象 2011: 573),“卮言”解放了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束缚,是为了听者自悟而形成的一种语言符号表征,不是一种逻辑的演绎过程。“卮”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器皿,“卮”的特质是“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遂人”(郭象 2011: 494),所以,庄子的“卮言”是一种舍己从人模式的语言交流活动,是为了触发听者的自我对话。显然,“感而遂通”的认知不是他人可以教会的,而是需要自己来体悟,所以自我“对话”就显得非常重要。庄子还推崇“重言”,提出“以重言为真”(郭象 2011: 569)。“重言”也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只需要对“重言”信以为真。“重言”所释放的内容反常规认知,很难通过理性思考充分理解,但信任这样的“重言”就能有收获。“卮言”的不确定性与“重言”的毋庸置疑性,都不符合语言符号活动的规律,因为这些语言形式都是为了借语言说非语言。

除此而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象符号也是反向认知重要表现方式之一。语言符号通常是对客观复杂现象的凝练表征,即主体对客体认知的确定性表达。然而,象符号则恰恰相反,是通过“原象”来指涉万事万物的变化,揭示事物的复杂性,也就是“原象”作为“能指”可以对应于多个或者无数变化形成的“所指”。具体说来,《周易》以阴阳为基本元素,用阴爻“-”和阳爻“-”作为“原象”(能指),又由阴阳组成了八卦。两卦再重合后组成六十四卦,象征天地万物。显然,与此相对应的“所指”则是千变万化的阴阳组合,“能指”不仅不再与“所指”一一对应,而且两者的关系是一对多,甚至一对无限。因此,象符号不是为了归纳和概括意义,而是为了释放意义。象符号改变了“人说符号”的逻辑关系,而是“符号说人”。也就是说,象符号帮助人从语言符号的概念束缚和制约中解放出来,赋予符号以意义的自由。

在《周易》中象符号的构成,运用了法天取象的方式,即“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王弼 2012: 247)。法天取象是一种对自然文本的解读,自然文本是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文本,自然文本的最大魅力是自然中亘古变与不变合一的文本内涵。万事万物中都含有阴阳,动静也是阴阳,所以“阴阳”的解释项也不能确定,阴阳重叠而成其余卦象。正因为阴阳的

“所指”是不固定的,那么由此构成的各种象符号就拥有了无限的解释性。阴阳之说对中国古代医家、兵家、哲学家、养生家几乎各门各派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王弼 2012: 236),而这一切都源于阴阳两个原象符号,所以《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王弼 2012: 236)。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符号迥异于语言符号。索绪尔有意识地把理据性象符号排除在语言符号之外,这样可以坚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时间性不被干扰。皮尔斯虽然没有绝对把语象分开,但他也是主张语象分治。皮尔斯的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的三分法,就是为了将语言符号与异质符号划清界限。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符号恰恰是为了消解语言的意义表征,这样才能真正传播类似于“感而遂通”这样的反向认知。

除了《周易》中以阴阳为原象的象符号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象符号,比如,有些特殊的音乐也有象符号功能,所谓“乐者所以象德也”(胡平生 2017: 730);有些特殊图形乃至绘画也有着象符号功能;甚至青铜器等器皿也承担着一定象符号的功能。中国传统文化中象符号的目标可以统一用八个字来概括:“象以载道,道以象显”,也就是说“象”只是一个载体,“道”才是根本,既不能陷于“象”之中,又不能忽视“象”的作用。如果没有“象”就不能显现出“道”。老子的“大象无形”(王弼 2011: 116)正是这个寓意。拘于象符号寻求“道”属于缘木求鱼,而完全脱离象符号之后“道”将了无痕迹。只有基于象符号,又超于象符号,才能真正“执大象,天下往”(王弼 2011: 91)。“感而遂通”的反向认知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象符号丰富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有关自有理论建构的问题一直存在。王文斌和柳鑫淼指出,我们自己的外语教育尚未提升理论自信 and 理论自觉,惯于照搬、紧跟或模仿国外理论和实践,缺乏自我构建理论和自我实践的勇气,沦为国外理论和实践的“打工仔”(王文斌、柳鑫淼 2021: 3)。精神文化符号学的提出是对构建自有理论的有益尝试,反向认知有利于推进教学模式的改革,不仅在高年级或研究生教学中能够对现有的理论和知识提出反思,而且可以从对语法、构词、发音规则等质疑的维度,实施具体教学,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助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此外,外语教育和研究需要突破工具理性的桎梏,避免陷入“无用之用”的思维倾向(李崇华、张政 2022: 32)。反向认知正是要在注重培养语言习得者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强调其人文素养的提升。在“道”的层面培养富有独特见地、立场坚定、具有跨文化意识且视野开阔的语言服务和创新人才。

5. 结语

当今,人类在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活动中,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人类社会也进入了泛符号主义(pan-semiotism)时代,不仅符号活动被视为人的本质特征,而且世界已成为一个信息化、高科技、人工智能的符号化世界。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在人的主体性作用达到了发挥极致的同时,返回客体、自然主体论的思潮必然重新崛起。在符号学界,一场由“人说符号”转向“符号说人”的哥白尼革命正在发生。其实,人类越是利用自身的智慧不断取得进步,就越是能够感到经验与理性的不足,甚至是认知的瓶颈。“感而遂通”的反向认知就是要践行“无思”“无为”的行为方式,体悟超越经验与理性的感通。

精神文化符号学力求建立符号活动的双向过程,一方面可以从主观到客观认知世界并用语言符号加以表征;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客观到主观感知自然信息并反向释放符号意义,从而形成一种感通世界的循环认知模式。其实,人类的认知模式也主要有两种,也就如黄宗羲所说“丽物之知”和“湛然之知”(黄宗羲 1986: 601)。两者并举才能实现以相“通”为基础相识,以知“道”为基础的知识,同时,不仅追问世界“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寻求人类“应该”如何存在,进而使天地精神、宇宙精神能够浸入人们的身与心。正如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郭象 2011: 569)。只有悬置人的主体性而不敖倪万物,才能真正融合天地的精神。文化的传承最核心的是精神的传承,精神文化符号学目标正是要践行天地间人与自然融合的精神。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研究是对中国语言文化以外的一切事物的认知和思考,是在世界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杨枫 2019: 2),而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能服务于我国的语言文化产业,更能加快此进程。“感而遂通”曾经在中印文化交融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印度佛学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希冀“感而遂通”也能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东西方语言符号交流中架起一座特殊的文化沟通桥梁,为高校外语研究与外语教学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实现人类文明终将达到“不同同之谓之大”(郭象 2011: 230)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 [1] Peirce, C. 1998.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2) (1893-1913)[M].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 Hume, D. 2009.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 Auckland: The Floating Press.
- [3] Lotman, M. 2002. Umwelt and semiosphere[J]. *Sign System Studies*, (1): 33-40.
- [4] Maran, T. 2007. 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J]. *Sign Systems Studies*, (1): 270-294.
- [5] 程颢 程颐. 2002. 二程集[M]. 北京:中华书局.
- [6] 丁原明. 2004. 《横渠易说》导读[M]. 济南:齐鲁出版社.
- [7] 房玄龄注. 2015. 刘绩补注. 刘晓艺点校. 管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8] 郭象注. 2011. 成玄英疏. 曹础基 黄兰发点校. 庄子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
- [9] 韩旭. 2021. 知觉的模式识别理论对“休谟问题”的进一步扩大[J].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70-75.
- [10] 胡平生译注. 2017. 礼记[M]. 北京:中华书局.
- [11] 黄宗羲. 1986. 宋元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
- [12] 李崇华 张政. 2022. 外语教育“道”“器”之共轭:翻译学科视角[J]. 外语电化教学, (3): 29-32.
- [13] 刘立夫 魏建中 胡勇译注. 2013. 弘明集[M]. 北京:中华书局.
- [14] 刘钊. 2003. 郭店楚简校释[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15] 皮尔斯. 2014. 赵星植译. 论符号[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16] 邵雍撰. 2012. 皇极经世书[M]. 北京:九州出版社.
- [17] 司海维. 2013. 外语教学中的元认知与元认知能力培养[J]. 文教资料, (19): 175-176.
- [18] 王弼 韩康伯注. 2009. 孔颖达正义. 周易正义[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 [19] 王弼注. 2011. 楼宇烈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M]. 北京:中华书局.
- [20] 王弼撰. 2012. 楼宇烈校释. 周易注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
- [21] 王守仁. 2012.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2] 王文斌 柳鑫森. 2021.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若干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 1-12.
- [23] 王先慎撰. 2013.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
- [24] 王秀梅译注. 2015. 诗经[M]. 北京:中华书局.
- [25] 夏征农主编. 1979. 辞海[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26] 杨枫. 2019. 外语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构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4): 1-2.
- [27] 叶蓓卿译注. 2011. 列子[M]. 北京:中华书局.
- [28] 张载撰. 2020. 王夫子注. 张子正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9] 赵毅衡. 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30] 朱熹集注. 2013. 孟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Word-formation and syntax both function to combine linguistic units and yield structured objects that can receive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s phonologically and semantically. Their products — words and phrases — manifest properties that are different in some aspects but similar in others, giving rise to the inevitable question of whether words are generated via lexical or syntactic rules. Different answers to this question define two approaches to word-formation: lexicalist and syntactic.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syntactic approach and its application to word-formation in Chinese, together with an outlook on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its future research. It points out that the syntactic approach, which hypothesizes that syntax is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structures of both words and sentences, has proved to be conceptually more economical and empirically more adequate. Its extensive application in research on Chinese word-formation has helped solve many problems and provided new insights into the data.

Key words: syntactic approach to word formation; lexicalism; compound; Distributed Morphology; Single Engine

Referential Status and Prosodic Encoding of the Subject in Mandarin LVS Construction, p.34. CHEN Ying, JING-SCHMIDT Zhuo, QIAN Guang & LI Yan

Noncanonical word orders encode noncanonical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packaging in discourse. The Mandarin Chinese Locative-Verb-Subject (LVS) construction features the noncanonical word order with which it introduces the inversed subject as new information (Chen & Jing-Schmidt 2014; LaPolla 1995). Chen & Jing (2021) found that native speakers of Mandarin Chinese were sensitive to the noncanonical word order of the Mandarin LVS construction, which they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construction typ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in Chen & Jing (2021), the current study conducted a grammatical perception experiment (Experiment 1) and a phonetic production experiment (Experiment 2)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ferential status of the inversed subject NP.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showed that LVS sentences with an indefinite subject receiv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cceptability ratings than those with a definite subject. Experiment 2 compared acoustic measures of the O in SVO, the S in SVL and the S in LVS produced by the same group of Mandarin speakers. The results showed prosodic prominence of duration and pitch range in the subject of the LVS sentences, providing acoustic evidence of its noncanonical information status. The results of the two experime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support the findings in the corpus study in Chen & Jing (2021) and hold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grammar.

Key words: LVS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status; indefinite referential; prosodic prominence

“Perceiving and Mastering”: Reverse Cognition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p.48. CHEN Zhong & YAO Tingting

Academic circles have becom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covering-up” of symbolic cogn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which has even sparked a linguistic tur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predicamen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reconsideration of cognitive model,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al of training talent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Using the semiotic theories of Saussure, Pierce, and Uexkül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umean problem in semiotic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perceiving and mastering” and the Humean problem in western linguistic semiotics. To improve language learner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huang Tzu’s idea of “the mind stops with recognition” can also be taken as a basis to free the symbolic meaning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experience and reason in the state of “unconscious and skilled.” In fact, the reverse cognitive path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will be a supplement to cognitive model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action of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Key words: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reverse cognition; perceiving and maste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ve Feedback in EFL Teaching in China: A Meta-Analysis, p.57. *WANG Lina, LI Shaofeng, MU Lei & WU Yongyi*

This study applied meta-analysis to synthesize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ve feedback in Chinese EFL learning settings. A total of 34 empirical studies were meta-analyzed.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immediate and delayed effects of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were 0.586 and 1.494. The immediate and delayed effects of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were 1.731 and 1.738.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rrective feedback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EFL teaching in China and the effect was maintained over time. With regard to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the effects of peer feedback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ose of teacher feedback; both direct feedback + indirect feedback and direct feedback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than indirect feedback; focused feedback showed larger effects than unfocused feedback; the effects of written feedback decli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treatment sessions. With regard to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the effects for secondary school and university learners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for primary school learners; the studies that measured learners’ achievements through constrained construction responses showed significantly larger effects than through mixed tests. 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rrective feedback research and EFL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EFL teaching; corrective feedback; effectiveness; meta-analysis

The Ordering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Adverbial Clauses in Different Stages: Differenc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p.71. *OUYANG Jinghui & JIANG Jingyang*

Based on a self-built corpu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English writing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rdering distribution in English temporal adverbial clauses (TAC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L2 learning by using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It is found that (1) Chinese students’ English TACs show a clear prepositive tendenc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2 proficiency, the prepositive tendency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2)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L2 learning, the syntactic complexity and spatial sequence iconicity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ordering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English TACs; (3) For middle- and high-level learners,